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粮食工业述论

李禹阶¹, 廖小波²

(1. 重庆师范大学 党政办公室, 重庆市 401331; 2.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物质条件与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是持久抗战的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粮食工业发展缓慢。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的粮食工业开始兴盛,碾米业、制粉业、切面业等蓬勃发展,官营与民营同步扩大,重庆的粮食工业因抗战而兴,呈现出明显的发展特点,为支持前线抗战和维护后方经济社会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全面抗战;重庆;粮食工业;前线抗战;后方经济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41(2016)02-0181-08

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能否持久抗战的极其重要因素。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与抗战大后方,对于重要战略物资粮食的需求直接促进了重庆粮食工业的发展。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深入,国统区大部沦陷,中国主要产粮地如江汉平原、华北平原、珠江流域等大多落入日军之手,沿江沿海的原国民政府或者民营的粮食加工业纷纷倒闭或停产。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大量军队、官员、文化机构及平民随之迁入,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人口急剧增加,军粮民食问题也随之成为国民政府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曾着重强调粮食问题在当时诸问题中的重要性,即“军粮第一,胜利第一”,提出:“我们现在抗战,要能获得最后胜利,……必须要能‘足食’”^[1]。

在这种背景之下,重庆的粮食工业开始迅猛发展,对保障军粮民食、推进持久抗战进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重庆粮食工业的发展,才使得国民政府能够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坚持下来,使得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大后方。目前学界对国民政府关于粮食问题的研究著述较多,而对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重庆的粮食工业还缺乏较为深入的考察与探讨。本文试对此展开探索,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的重庆粮食工业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²¹³²在我国历史上,无论是社会的稳定还是政权的巩固,莫不与“食”紧密相连。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与政权交替,从秦末农民战争至明末农民起义,大多皆因“食”而起,“食”足则天下太平、政权兴盛,“食”不足则天下大乱、王朝更迭。“食”对于民生与国家兴盛之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重庆的粮食加工业起源较早。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周朝的巴国时期,重庆就生产阳朴姜、堕林粉、清酒、伞子盐、蒟酱等食品调料,其蒟酱还远销南越(今广东和东南亚一带)。战国时期,重庆开始有了不同名称各式各样的糕点,如无馅烤饼、油炸食品等。秦汉时期,重庆加工的大米曾作为“贡

米”向朝廷纳贡。在唐宋时期,水稻、小麦成为重庆的主要粮食作物,食品加工业有了更大发展。到1905年前后,在城区陆续出现了碾米、磨面、切面等粮食加工业,形成了粮食工业的雏形。

20世纪20年代,重庆城郊的大米加工以土法碾制为主。由于城区内尚无大米加工厂,于是粮食由城外加工后输入城内。1925年,作为民营企业的韩府巷汪泚泗购入碾米黑油机一部,开始从事机碾业务。1934年,随着重庆电汽事业的发达,碾米业也开始使用电机进行粮食加工。

1926年以前,重庆制粉业仅为手工制粉作坊。直至1926年天津人单松年以4万银元独资在重庆牛角沱创设重庆第一家机制面粉厂——新丰灰(白)面厂,并且由上海德商汉运洋行负责购买面粉加工机器^{[3]44}。当时该厂日产面粉100袋(每袋44斤),1928年日产面粉则增至300袋^{[4]27}。1929年周立三等人集资10余万元在江北相国寺(新丰街)创办先农面粉公司,日产面粉240袋至300袋。1930年杨学优在南岸窍角沱创办了岁丰面粉公司,每日可出品面粉30余袋。1934年新丰厂“将全部机器家具,一律出顶”^{[5]58},银行家鲜伯良等买下新丰面粉厂更名为复兴面粉公司,自任经理,制造厂位于现重庆渝中区大溪沟,资本额为国币4万余元,又从汉口聘请专家进行技术升级,成本降低到与土粉一致,每月产量达6100余包,销售区域由主城区扩大为涪陵、丰都、泸州、遂宁、嘉定、成都等处,成为川东南及成都等地重要面粉加工企业^{[6]159}。

重庆的制面历史亦悠久。在清末,当时面条加工主要为手工生产的面条,其种类有切面、挂面等。切面是用手工和粉、揉压、摊皮、刀切,当时主要是面食店自产自销。挂面是用手工合粉、揉制后,经盘条、发酵、拉面、挂架、晒干、收切、包装等工序制成,批量生产上市销售。清同治年间,北泉手工挂面已在市中区双溪沟设门市销售。1928年前后,重庆天宫街(今邹容路)陈云五切面店买回1台切面机,以人工手摇制面,为重庆第一家机制切面店。为加大面粉销售,复兴公司于1934年在市区开办了10家切面铺,价格与一般土粉切面一样,销售良好。岁丰面粉厂也同时在中区双溪沟开办了机制挂面厂销售挂面,后来陆续发展到10家,由此使重庆地区机制切面开始普及^{[7]310}。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的粮食工业

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国民政府大后方粮食危机逐渐凸显。为统筹粮食管理,国民政府决定大力发展粮食加工业。1941年春,时任粮食局局长卢作孚、副局长何北衡接受江汉罗氏的建议,商议组建官营中国粮食工业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首要工作为食米加工问题”,并且以达到“食米中谷稗可大量减少”^{[8]113}为目的,进一步提高粮食加工效率,减少粮食加工中的浪费。中粮公司计划“分设麦粉工厂、胚芽米厂、干粮工厂、机器修造厂”等,^{[9]25}将“各粉厂麦皮提炼成粉”^{[10]126},形成配套系列粮食加工企业。卢作孚等人还决定采用公司组织方法来组建“中粮公司”。同年4月,卢作孚在重庆成立了筹备处,聘请江汉罗氏为筹备主任,李俊夫、王一鸣协同筹备。公司资本初步确定为400万元(1944年扩大为1000万元),其中全国粮食管理局与中央信托局各认股150万元,中国农民银行认股100万元。资本规模确定后,筹备处随即开展勘定厂址、订购机器、拟定章程等筹备工作。9月9日,中粮公司筹备事宜完成并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公司章程,推选粮食部部长徐堪^①兼任公司董事长,李润生、浦心雅、陈钟声为常务董事,盛莘臣、庞松舟等为董事,瞿克恭为常务监察。之后中粮公司董事监事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聘请江汉罗氏为总经理,李俊夫、沈国瑾为

① 徐堪(1888—1969),字可亭,四川三台人。1905年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1907年,与谢持等在成都密谋起义,事泄后出走武昌。1909年入四川高等警官学校。1911年保路事起,率警官及陆军学校十余人,赴川北策动民军响应。四川军政府成立时,任第四标标统。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夔州关监督。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失败后逃往上海。1919年补选为四川省国会议员。1921年,参加在广州召开的非常国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任金融管理局副局长,主管上海金融。1928年,任财政部钱币司副司长、司长。1935年,任财政部常务次长。同年当选中国国民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政治会议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倡议将中国、交通两银行收归国有,并拟定币制改革规条。1940年任政务次长。1941年任粮食部部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主计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1947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1969年7月29日病逝于台湾。遗著由周开庆编为《徐可亭先生文存》。

协理。公司宣布于 1941 年 10 月 1 日正式成立,公司位于中正路中信大厦二楼,下设粉厂 2 所、米厂 11 所、干粮工厂 1 所、修造厂 1 所,并设有总营业处及承销食米支店 10 处。当时公司有职员总共 115 人、夫役 146 人、技工 193 人、杂工 1 352 人,在重庆、成都、内江、合川等地设立多家工厂。自中粮公司成立后,重庆的粮食加工业开始由官营与民营共同经营发展,为重庆军民和前线部队提供稳定的粮食来源。在国民政府粮食统制政策的背景下,重庆官营碾米业开始主导粮食加工。当时中粮公司在重庆城区所设立的有朝天门(后改为千斯门本厂)、大溪沟、李子坝、菜园坝等 4 厂,在近郊则设立有化龙桥、弹子石、红砂碛、李家沱、大渡口等厂,在迁建区设有歌乐山、北碚 2 家。后因战时需求,为提高粮食加工效率,对地点偏僻、业务量不大、开支浩繁的米厂加以裁撤。截至 1945 年 6 月,中粮公司在渝碾米厂经合并,仅存李家沱、千厮门、大溪沟、菜园坝、化龙桥、弹子石、红砂碛、北碚及董家溪等 9 家^{[11]27}。

表 1 1945 年中粮公司在渝碾米厂

厂名	负责人及姓名		厂址	每日生产能力		开办日期
				砻谷	碾米	
李家沱米厂	厂长	施家鸿	李家沱工业区	2 000 市石	1 000 市石	1941 年 11 月 14 日
千厮门米厂	厂主任	方兴洲	千厮门	1 200 市石	800 市石	1941 年 11 月 14 日
大溪沟米厂	厂主任	蒋仲华	大溪沟	1 000 市石	800 市石	1941 年 11 月 14 日
红纱碛米厂	厂主任	文 辅	江北红砂碛	1 000 市石	600 市石	1941 年 12 月 6 日
菜园坝米厂	厂主任	蔡启鳌	菜园坝	1 200 市石	800 市石	1941 年 12 月 28 日
化龙桥米厂	厂主任	陆孟益	化龙桥正街 73 号	800 市石	500 市石	1942 年 12 月 25 日
弹子石米厂	厂主任	汪新民	南岸弹子石	800 市石	500 市石	1942 年 1 月 6 日
北碚米厂	厂主任	刘正勋	北碚武昌路乾洞子	1 000 市石	500 市石	1942 年 5 月 23 日
董家溪米厂	厂主任	文辅一兼	江北董家溪	——	800 市石	1945 年 3 月
		总计		9 000 市石	6 300 市石	

虽然粮食加工厂数量减少,但是其生产效率却超过以往时期,这对于大后方粮食工业发展有着一定作用。

同时,重庆制粉工业开始蓬勃发展。自武汉失守后,一方面由于重庆人口激增、米价日益高涨,另一方面沿江沿海制粉厂开始向内地迁移,市民购食面粉日渐增多,重庆官营与民营的制粉工业开始发展开来。民营制粉厂以战前的 3 家(先农由复兴兼并)与之后的福民、福新、天城等 5 家为主,1938 年 8 月沙市正明面粉厂迁入,与江苏人袁国梁在江北红砂碛建立了福民面粉厂,后于 1942 年由福民实业公司全部收购。同年(1938 年),复兴公司资本额进一步扩大为 20 万元,出品面粉改为“麦穗”牌,并出产少量饼干。先农面粉公司因经营亏损、担心日机空袭受损而由复兴面粉公司“给价承顶”而改组为复兴第二厂^{[12]197-198}。1939 年 5 月福新机器面粉厂成立,1942 年天城机器面粉厂成立。1940 年至 1945 年,重庆城内又成立了 12 家规模较小的面粉厂,日产总量约 1 500 袋(每袋 44 斤)。1942 年,重庆制粉业依法改组为同业公会,公推福民总经理袁国樑为理事长^{[13]29}。同年,中粮公司所设立的李家沱面粉厂开始开工,第二年合川粉厂开工。为避免日机空袭,一家建于合川城外三佛滩,一家位于距重庆城区二十里之李家沱正街 27 号。

1941 年开始,重庆民食供应处对机制面粉实行配销,后由于居民饮食习惯逐渐向面食倾斜,加之制面对资金需求不大,全市切面业发展较快,面条摊点遍布全城大街小巷,至 1947 年全市切面、挂面生产企业达到 477 户。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粮食工业的发展特点

1937 年之后重庆的粮食工业,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下,虽然技术与规模不能与西方发达的

近代粮食工业相比较,但在国民政府与业界同仁的努力坚持下,克服了技术落后、运输艰难、日机轰炸等种种困难,在抗战时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它与近代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相适应,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点。

(一)在粮食加工方面步入近代工业化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的碾米业在加工技术上,多数碾米厂以土碾为主,设备为砻谷机、碾米机。砻谷机一般为木制,碾米机则是以石碾为主,物料运输以人力肩挑、背扛、手端为主,动力以人力、牛力为主。加工工艺上,则一般是先砻后碾,即一般使用土砻先加工成碛米,然后用石碾或铁碾米机碾制成熟米,这种方式劳动强度大、成本高,零散分布于城区近郊。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迁入工厂增多与中粮公司的成立,重庆粮食工业逐步跨入近代工业化领域,重庆的粮食加工技术也随之完成了近代化历程。如当时规模最大的李家沱工厂,其砻谷碾米部分所用机器为英国路易格兰(Lewis Grant)厂制造的大型自动砻谷碾米机一架,于 1942 年 12 月装配完成开工,每日最高生产能力达 2 000 市石,每分钟可砻谷 1 市石以上,为当时国内最大最先进的砻谷碾米器。该厂另有德国布威勒(Buehler)厂制造的大型干燥机,每日可干燥黄谷 1 500 市石,每分钟可干燥 1 市石,在当时为创举。该厂还建有新式包堆仓 2 座和临时仓 3 座,分别可容纳 9 000 市石和 15 000 市石,指定作为抗战献粮大省四川省的四川粮食储运局之米粮运渝集中地点。

清末民初以来,重庆的面粉加工企业使用石磨生产面粉,磨粉机是面粉加工主要设备,广泛使用石磨技术,加工工艺上是采用“中路出粉法”,麦麸和麦心在心磨系统中依靠光磨出粉,可产等级粉,但出粉率极低,仅约为 66.4%。^{[3]309} 中粮公司成立后,重庆制粉业开始引进近代先进自动磨粉机,就规模而言以合川厂为大,其动力与水电均可自给,装备了粉磨机 4 部,蒸汽发动机 2 部。李家沱厂在设备上则有小型三袋式磨粉机一具,品质与渝市民营粉厂相当,在利用原料方面则与渝市民营厂更胜一筹,每市石乙下级小麦可制面粉 2.25 袋,每袋 44.45 市斤,而一般民营工厂出粉率则仅为 2.1 袋,较之公司粉厂浪费较大。

(二)加工规模不断扩大,加工能力不断增强

在碾米业方面,1936 年重庆始有自产自销的民营机器大米厂 9 家,其中配置电马达精米机 5 家,配置油动力精米机、碾米机各 2 家,日产大米最低 0.75 吨,最高 5.25 吨^{[14]306}。后由于重庆人口激增,在对粮食需求的刺激下,重庆的民营碾米厂快速发展,至 1939 年 4 月,全市有机碾 10 座,有机器马力 145.5 匹,每日产出白米 350 市石,销售分店共有 23 家^{[15]1}。1945 年重庆民营各机械碾米厂每月承碾公私米粮约 9 300 余市石,每月收入 8 897 630 元,支出 6 388 167 元^{[16]157-161}。

表 2 1936 年至 1945 年重庆市民营机器碾米厂加工规模表

时间	机器马力总数(匹)	日产大米	工人数
1936 年	——	0.75~5.25 吨	——
1939 年	145.5	350 市石	73
1942 年	——	——	——
1945 年	——	9 300 市石	541

在抗战胜利前夕的 1945 年,加上中粮公司所属企业,全市机器碾米厂得到了快速发展,与 1936 年相比,机器碾米厂从 9 家发展到了 117 家,增长了 13 倍。全市日产大米从 1939 年的 350 市石提高到了 14 600 市石(含中粮公司日产大米 5 300 市石),产量增长达到了惊人的 41 倍之多,民营厂的从业工人则由 1939 年的 73 人扩大到了 541 人。

在制粉业方面,1911 年重庆城内有 100 余家土磨房,日产面粉 500—600 袋,供应城区 20 万人口。1923 年至 1924 年四川(含重庆)米荒发生,面粉成为重庆主食之一,对缓解米荒“帮助不

小”。^{[5]57} 1929 年至 1934 年,重庆陆续建立了先农厂、岁丰厂、复兴厂,月产面粉 21 300 包^{[6]159},到抗战期间的 1941 年,重庆全市每日可产面粉 4 000 袋^{[17]28}。进至 1944 年 12 月,全市月产面粉 126 778 袋(含官营李家沱制粉厂)^{[18]7}。其中中粮公司两粉厂 1942 年生产特粉 3 085 袋,统粉 6 419 袋,进至 1945 年随着粮食需求旺盛和技术更新,两厂产量也逐年递增,仅 1—6 月便生产特粉 23 770 袋,统粉 77 380 袋,其产量为开办之时的 70 倍和 12 倍以上^{[19]32}。从 1911 年至 1944 年,全市制粉量增长了 8.45 倍。

表 3 1911 年至 1944 年重庆市制粉厂加工规模表			
时间	厂数(家)	月产面粉(袋)	备注
1911 年	100 余	15 000—18 000	日产 500—600 袋
1934 年	先农、岁丰、复兴	21 300	三厂产量
1941 年	复兴、岁丰、福民、福新、天城等	120 000	全市产量
1944 年	复兴、岁丰、福民、福新、天城等	126 778	全市产量

(三) 民营与官营粮食工业同步发展

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由于两湖一带尚未落入敌手,加之军队大多能就地筹粮,国统区粮食供给趋于平稳,国民政府对粮食问题也就尚未重视与管理,对粮食加工采取放任的态度,无论是碾米业还是制粉业,重庆的粮食加工仅由民营企业进行。1936 年,重庆有民营机器大米厂 9 家^{[14]306},1939 年 4 月,全市有机碾 10 座,大碾(牛碾)64 座,小碾(槽碾)42 座^{[15]1},土碾 96 家。在制粉业中,1911 年重庆城内有 100 余家土磨坊,1926 年开始至 1934 年,市内陆续创办了新丰(1934 年更名为复兴)、先农、岁丰机器制粉厂,民营加工业开始了发展。

1939 年中日双方军队开始围绕长沙开展会战,加之两湖粮食产地沦陷、1940 年四川粮食歉收,同时大量军民迁入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军队粮食供应逐渐由就地筹粮改为由后方供给。由于当时四川等地粮食歉收,人口增加,政府军粮收购日渐困难,大后方粮食危机开始出现,四川、重庆等地的粮价猛涨。在 1939 年 12 月,重庆粮价指数为 167,1940 年 7 月则涨至 592。为此,国民政府虽然于 1941 年成立了官营中粮公司,由政府主导开展粮食加工业务,以掌控粮食输出,减少财政负担。但是由于重庆为战时陪都,人口稠密,每月米粮消费在 15 万市石以上,需求甚多。加之重庆为战时粮食中转站,大量收购的粮食需要在此加工。这样就使中粮公司所属加工厂大多设立于重庆。同时由于中粮公司所属工厂加工能力仍然不能达到大后方军民的粮食需求,因此国民政府又倡导民营企业进入这一行业。这样,重庆在粮食加工领域进入了官营民营同步发展的新时期。

表 4 1936 年至 1945 年重庆市民营机器碾米厂统计表	
时间	厂数(家)
1936 年	9
1939 年	10
1942 年	37
1945 年	108

1942 年年末,全市民营机器碾米厂已经发展到了 37 户^{[15]14}。此外,全市有小规模的谷米加工厂 138 家。1945 年,国民政府曾对重庆民营各机械碾米厂开展统计,结果为 108 家,共有职员 454 人,工人 541 人^{[19]157-161},官营碾米厂则为 9 家。

1938 年,沙市正明面粉厂迁入,与江苏人袁国梁在江北红砂碛建立了福民面粉厂,1939 年汉口福新第三面粉厂迁到重庆南岸猫背沱,1942 年杨济人在江北猫儿石又创办了天城机器面粉厂。此外,1940 年至 1945 年,城内又成立了 12 家规模较小的面粉厂。官营制粉厂则为中粮公司李家沱、合川 2 厂。

在官营民营同步发展的基础上,为分别管理与划分职责,国民政府将加工厂服务对象进行了大体区分。官营加工厂主要集中在军粮、公粮的供给,以确保军队对日战争需要和维持机关的正常运

转。民营加工厂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设备较先进的工厂,改由陪都民食供应处特约承碾公粮,其余各碾米厂则承接民众业务。如 1942 年四川小麦丰收,粮食部专门为重庆民营粉厂储备了 20 万石小麦,规定各厂每月向陪都民食供应处供应面粉 6 万袋,“政府照本百分之四利润”^{[20]38}统购,多余产品则可自行销售。在官营与民营粮食企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重庆粮食工业就进一步发展起来。

(四)重庆粮食工业与抗战进程密切相连、与重庆战时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1937 年 10 月 30 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于 1939 年 5 月 5 日将重庆升为特别市,由行政院直辖^{[21]34}。1940 年 9 月 6 日又宣布重庆为“永久陪都”,成为远东抗击法西斯的指挥中心和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城市,重庆行政地位因抗战而提升。随着国府西迁,东部地区大量工矿企业与人口开始向重庆迁移,重庆工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成为战时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规模最大的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重庆的工业由此完成了向近代化的转变,重庆的粮食工业也随之兴盛,碾米业、制粉业、切面业等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同时,重庆城区面积不断扩大,1939 年城区面积为 164 平方公里,1941 年扩大为 294 平方公里,1945 年为 300 平方公里。同时,大量高校与人口同步迁入,1939 年 3 月重庆人口增至 53.47 万人,1942 年增至 83.09 万人,1946 年更是暴涨至 124.5 万人^{[22]386}。加之大量驻军,重庆人口因抗战而骤增,对粮食及其加工品的需求旺盛,刺激了重庆粮食加工业的发展。

战前重庆的粮食加工业就开始了发展。从范围上讲,主要是由城郊逐步发展到了城区。从粮食加工的动力上讲,由人(畜)力发展到了机械动力。从工厂的数量讲,机械碾米业从无发展到全面抗战前的 9 家,机械制粉业从无发展到战前的 3 家,切面业同样从手工发展到半机械工艺,其发展轨迹为循序渐进的逐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与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政策,导致重庆粮食工业的快速发展。从经营主体上讲,由单纯的民营发展到了官营、民营的同步进行。从数量上讲,碾米业由 9 家发展到了 1945 年的 117 家,机械制粉业由 3 家发展到 19 家,切面挂面业则由 21 家发展到 1945 年的 477 户。从产量上看,民营机械碾米业由 1939 年 4 月每日产出白米 350 市石发展到 1945 年每月承碾 9 300 余市石,机械制粉业由 1934 年月产 21 330 包发展到 1942 年约 14 万袋,重庆的粮食加工生产规模以突变的形式在战时迅猛发展起来。

四、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粮食工业的作用及影响

重庆的粮食工业,在全面抗战时期获得快速发展,既稳定了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后方经济秩序,确保了重庆粮食供给,又对支持抗战进程及促进重庆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和影响。

首先,重庆粮食工业快速发展巩固了大后方战时经济,支持了全民持久抗战。战时重庆粮食加工业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粮食加工史上大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随着战时国民政府沦陷区产粮地的不断丧失与重庆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使得重庆的粮食消费市场不断扩大,粮食供给矛盾日益严峻,国民政府于 1941 年 5 月 24 日制定了《征收实物纲领》,7 月 23 日财政部公布了《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将田赋由货币交纳改为稻谷、小麦等实物交纳,为重庆的粮食加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加工来源,重庆的粮食加工业获得了发展机遇。由于实行粮食管制,1940 年 8 月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大米加工行业的管理,规定粮食加工业主及其租用人均应向当地粮食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机关申请登记。田赋征实后,因大米加工设备不足,大多招商承包碾米,政府又通过签订碾米合约的办法,对大米加工行业实施管理。全市 5 家面粉厂也全部替政府加工,产品由政府包销。这使得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统制与限价成为现实可能,不仅大大推动了当时粮食加工的空前发展与近代化,而且稳定了抗战后方的粮食供给与前线军队的粮食需求,如中粮公

司各碾米厂从 1942 年至 1945 年 6 月三年半以来,共接受陪都民食供应处四川粮食储运局代加工黄谷 794 900 市石、碾米 1 819 510 市石,加工以后交出碾米 163 000 市石、熟米 1 829 686 市石,约相当于重庆市民三年半以来全部消费总量 30% 以上^{[11]28}。中粮公司所属两粉厂共供应军粮 54 273 袋,并奉军政当局命令在军用面粉中特别增加了维他命 B 含量,以满足前方战士营养需求,这为坚持持久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次,促进了重庆地区农业生产的副产品销售及利用,使粮食生产、利用的效率提高。按照当时惯例,对米谷加工免收加工费,由各厂将米谷加工剩余之糠谷留下出售或加工售出,以作为开支或盈利。粮食加工的副产品主要分为米与麦两类。碾米厂加工剩余之副产品主要有谷类、二节米(大碎米)、碎米(分熟碎、大碎、小碎)、米糠、谷壳、霉米霉谷霉碎、糖糟等,而制粉厂加工剩余之副产品主要为麦皮、脚粉两类。以上各类副产品,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内粮食供应较为充裕,其价值微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全面抗战期间,因粮食等各类物资供应紧张,物价连年飞涨,由于粮食加工剩余物质可加工利用,最低限度也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可制成各种营养品出售,因而其副产品价值也随之上涨。中粮公司聘请了多位农业与化学领域专家,对剩余副产品进行加工研究,收到良好成效。(1)因战时燃料紧缺,酒精成为军队主要液体燃料动力必需品。为支持抗战,中粮公司于民国 1944 年 8 月 15 日出资收购了位于李家沱工业区的上川实业公司所属酒精厂,更名为中粮公司农化工厂,接手之后,公司聘请沈学源为厂长,工厂主要以各米厂加工剩余之副产品及一部分变质之霉米霉谷为原料,其工艺经沈学源设计为经过糖化提取麦芽糖,再用蒸汽杀菌,待冷却后加入酵母,最后经过蒸酸手续,产得 95% 标准的酒精,每月可生产三万加仑,主要由国民政府战时生产管理局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统购统销,供应军队使用。(2)霉米制维他益也为沈学源独创营养技术,采用低压喷雾式干燥法,在 60℃ 温度以下加以干燥制成,产品为圆形,呈淡黄色,含维他命 BDG 三种,并含蛋白质 48%,磷、铁、钙等矿物质 8%,脂肪 2%,可溶性糖 21%,植物性肝臟粉 16%。有增进营养、促进新陈代谢、补血及增加皮肤抵抗力、防治脚气病及软骨症、减低血压、治疗糖尿病、防止神经发炎及神经衰弱病等功效,产品销路旺盛,时有缺货无法供应市场需求现象。

再次,促进了重庆粮食工业的多元化发展。除了碾米、粮食副产品利用外,重庆的粮食加工还呈现多样化。如以切面业为例。切面业在战争之初,在重庆仍然是属于消费较少的粮食制品。抗战期间,随着大量北方军民以及其他地域民众涌入重庆,各色人等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及消费习惯,面粉、面条的消费迅速增加,这就使重庆的切面业蓬勃发展,使之成为继大米业之后的第二大粮食加工领域。而随着切面业的发展,面条也逐渐成为重庆市民第二大主食。由于重庆面粉厂产量较大,面粉的销售较之大米甚为困难,因而各面粉厂努力将面粉加工成各种食品销售,使当时重庆的食品品种及质量在大后方颇有名气。面粉工业的发展,一方面又推进切面业的发展;同时在米价连续高涨、供应紧张的背景下,经过一些粮食加工企业的努力推动、宣传,特别是如著名的粮食企业复兴公司的多年努力的推动下,重庆市民面粉、面条消费量大大增加,并且于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真正学会了吃面粉”^{[4]29},使重庆面粉工业迅速发展。而与之有关的重庆小面,也在抗战时期切面业的发展中,其品种、类型、口味也不断多样化,由此成为重庆的小吃代表而名扬天下。

综上所述,重庆粮食工业的发展有着自己特殊的进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粮食工业循序渐进,发展较为缓慢。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争进程,重庆的粮食工业也开始兴盛起来,以碾米业为代表,而带动制粉业、切面业、粮食副产品制作等行业的蓬勃发展。由于抗战的需求,在国民政府推动下,除了官营粮食工业从无到有之外,过去长期徘徊不前的民营粮食工业也迅速发展,呈现官营与民营同步扩大的趋势,使重庆民营粮食工业在抗战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稳定了抗战

经济,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大后方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以,重庆的粮食工业因抗战而兴,并与重庆战时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呈现出明显的战时经济的特点,其为支持前线抗战和维护当时大后方经济社会的稳定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 保生,辑. 蒋委员长关于军粮经理之言论[J]. 陆军经理杂志,1942,3(2).

[2] 司马迁. 管晏列传[M]//史记:卷 62.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杂纂:重庆开设面粉厂[J]. 中外经济周刊,1925(137).

[4] 重庆面粉工业的剖视[J]. 新世界,1944(11).

[5] 面粉:重庆面粉业近况[J]. 四川农业,1934,1(5).

[6] 产业:重庆面粉业近况[J]. 四川月报,1936,9(6).

[7]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重庆市志第 4 卷(下)食品工业志[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 中国粮食公司开始食米加工(中央社十月二十九日)[J]. 经济汇报,1941,4(11).

[9] 国内及本市劳工简讯:筹备粮食工业[J]. 劳动界,1941(19).

[10] 经济杂讯:国内:工业:(五)粮食工业各工厂在筹设中(九月四日大公报)[J]. 经济汇报,1941,4(7).

[11] 王伯天. 三年来之中国粮食公司[J]. 粮政季刊,1945(2-3).

[12] 产业:工业:重庆复新面粉公司近讯[J]. 四川月报,1938,13(12).

[13] 重庆面粉工业的剖视[J]. 新世界,1944(11).

[14] 李秀义. 重庆市的碾米业(1937 年 4 月 1 日调查)[J]. 建设周讯,1939(8).

[15] 四川省志·粮食志编辑室. 四川粮油市场志[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19] 张光旭. 调查研究:重庆市民营电机碾米厂概况调查(附表)[J]. 粮政季刊,1945(1).

[20] 工业动态:四川:粮食部协助粉厂开工[J]. 中国工业(桂林),1942(6).

[21]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 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之国府迁渝·明定陪都·胜利还都(1937 年 11 月—1946 年 5 月)[G].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22] 隗瀛涛. 近代重庆城市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